

让死亡拥有多种正确答案

1 在所有的“死亡课”中,耶鲁大学教授雪莱·卡根的《死亡哲学》可能是最有名的一个。他的课程录像被放在网络公开课上,获得了数亿次的点击量。

“我本来从没想过要开一门关于死亡的课程,但是我发现,我们能够公开讨论死亡的地方,居然只有教堂和医院。”卡根说,“这太荒谬了!渐渐地,我们对于死亡的理解变得同质化,它变得只跟上帝有关,只跟医学技术有关。这让我很不满意。”

于是,卡根开设了这门叫做《死亡哲学》的公共选修课。他盘腿坐在讲桌上,摊着手说:“你不要跟我讨论社会学角度下感人的死亡故事,也别跟我说美国的殡葬业有多暴利。反驳我的时候,不要说‘因为上帝是这么说的’或者‘神是这样安排的’。在这间教室里,我们只讨论死亡的哲学话题,用哲学的方式。”

2 北京大学医学部王一方虽然也想跟卡根一样,开一门独立的“生命哲学”课,但现在的王一方,身份其实是教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授。热衷研究生死话题的他,只能在每次上课“偷偷运点私货”。

在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课上,他讲的马克思不是那个“恨不得天天指点江山的高大伟人”。“马克思是个病人,你知道吗?”王一方说,“他不仅是病人,还是个病人家属。”

这个做医学叙事学分析的老师翻出来马克思的私人书信,有理有据地分析着:马克思的一生都在跟死亡打交道,今天妻子生病了,明天女儿去世了,自己还落了一身病,抽烟酗酒又熬夜,又得肝病又犯痔疮,一辈子没有几天清静日子,天天跟死亡做斗争。他写给恩格斯的信里,说得最多的不是革命理论,而是借钱治病。

“第一堂课讲完马克思的死亡观,后面基本上就没人逃课了。”王一方笑道。

3 陶国璋是香港中文大学的哲学教授,他教授的《死亡与不朽》课程已经开课20多年。他课上的学生大都是刚上大学没多久的本科生。每次一上课,陶国璋看着台下年轻的面孔,都会开玩笑地跟他们说:“大家怎么这么想不开呀?你们才这点年纪,就都跑来学习死亡了?”

跟其他死亡课老师不太一样,陶国璋教授这门课跟自己的经历有很大关系。他7岁的时候就患上肾病,39岁那年又动了肾脏手术,被疾病折磨许多年,“有好几次跟死神打了声招呼”。

因为生病,陶国璋常常一个人在医院养病。在那时候,他看了好多死亡主题的电影,阅读了许多关于死亡的哲学经典。他读到了尼采的话,“如果一个人能在世界找到一个活下去的理由,他就能面对任何的困难。”所以直到现在,碰到跟死亡有关的新

耶鲁大学、香港中文大学等名校都开设有主题为“死亡”的课程。在课堂上,没有一味地抹眼泪,也没有惊慌失措的恐惧,大家坐在一起,心平气和地讨论一个问题——既然死亡是生命中不可避免的节日,我们该如何面对死亡?



美国母亲辛迪陪在身患癌症的儿子身边,用爱引导他面对死亡。拍摄此事的美国记者蕾妮·拜尔获得2007年普利策特写摄影奖。



耶鲁大学教授雪莱·卡根在上《死亡哲学》课。

闻,他还会停下来想一想,为什么要活下来,为什么不能放弃。

让他意外的是,当他回到学校教书,发现那些健康的年轻人竟“对价值有一种失落”。他们动不动就放弃,这让他很担心。“每个时代的人都会死,但我们这个时代却似乎缺乏生命的沉重感,我想年轻人这么轻易地放弃了各种丰富的生命体验,跟他们对于自我价值的理解有关,生命似乎轻得着不到地。”他说,“死亡其实是‘生的局限性’,是生命的参照物,不理解死亡,就难以找到生命的价值。”

于是,陶国璋在统共13节的死亡课里,邀请不同背景的人,讲述自己视角下的死亡——佛学研究者讲述佛家的死亡,医生跟学生讲“什么才算好死”,甚至还有殡仪馆的工作人员,在课堂上跟学生分享真实的案例。

4 在复旦大学,胡志辉开了一门叫做《生命教育研究》的课程。他上课的方法很特别——学生做主导,由他们自己去挑,要讲什么话题。



新加坡罐头形公墓位于闹市区,共八层。DNA罐取代了骨灰盒,玻璃展示柜里展示着主人生前的遗物。

在几次课上,学生主动提出,聊聊死亡。在一个坐了20人的小教室里,学生们自己站起来讲述生活中曾经遭遇的死亡——哥哥自杀,同学跳楼,亲人辞世。

“在我的课上,我不讲理论,主要让学生自己去分享人生经历。我们分享彼此生命中沉重的人生体验,看到人性的丰富多彩,相互分担。”胡志辉说,“这样不会告诉你一个答案,告诉你该如何承受死亡,但通过看到不一样的生活,丰富了我们自己的生活,让我们多点对生命的理解。”

尽管如此,零星的死亡讨论还是略显单薄。虽然胡志辉也想多讲讲关于死亡的话题,但是由于他的课程奉行“学生主导”,所有话题都是学生选择的,所以,超过一半的话题都是“爱情”,只有星星点点的几节课在讨论“死亡”。

“看来,爱情比死亡更坚强。”胡志辉调侃地说。

5 王一方也喜欢让学生自己讲故事。比如讲到人类视角下的死亡,他就会请农村来的同学,给大家讲讲村里的死亡故事。村庄里的死亡并不完全是一件悲痛的坏事。通常情况下,如果丧事办得好,家里人还会感到安慰和满足,“走得挺风光的”。

王一方发现,一说起这些村头故事,来自城里的学生都不怎么说话,因为他们住在城里的单元房里,有时候隔壁房间有人去世,他们常常过了很久还不知道。

“村头故事对于我们每个人,是一种‘死亡脱敏’。它告诉我们,‘死亡就是夜幕降临’,‘回到祖宗的怀抱’,没什么好害怕的。我们当下之所以恐惧死亡,是因为死亡被现代医学恐怖化了。一想到死亡,就是躺在ICU里痛苦地插着管子的样子,每一口呼吸都

消耗大量金钱,每一秒心跳都可能导致亲人倾家荡产。”王一方说,“失去了村头故事后,我们对死的恐惧,其实变成了我们对生的恐惧,对家庭经济的恐惧,对人伦关系的恐惧。”

6 为了让死亡“感光”,陶国璋也在课堂上鼓励他的学生去参观殡仪馆,到解剖室触摸尸体。他发现,年轻人其实对死亡很好奇。有次上课上到一半,他带着学生到距离教室不远的解剖室参观,本来想着待上十几分钟就回教室,结果一下子待了45分钟。原本以为学生会恐惧冷冰冰的尸体,但他们却真的伸手去触摸实验室里的解剖样本。

7 并不是所有人都喜欢上“死亡课”。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医学博士的中国留学生小邓说,自己也上过这门课,特无聊。“医学告诉我要‘改变死亡’,你上个死亡课告诉我要‘接受死亡’,这不是和医学精神背道而驰吗?”小邓说,“我有那功夫还不如去学点技术,想着怎么早点把人治好呢!”

这个在肿瘤科实习的医学生说,第一次亲眼见到的死亡,是肿瘤终末期的病人。因为病情反反复复,死亡其实是个“没完没了”的漫长过程。他说,当最终看到病人的生命体征消失,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,“这就是死亡,不过如此”。

“你能在课上讲那么多道理,完全因为那不是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。当你自己面对死亡的时候,就只有0和1,简单粗暴。”他说。

王一方在课堂上要面对像小邓一样的年轻医学生。有次他在课上讲“马克思之死”:凌晨两点,恩格斯下楼跟人说了两句话,上楼一看,马克思坐在摇椅里,因为呼吸衰竭,在短短两分钟内猝死。

听完这一段,台下的医学生一脸羡慕地跟王一方说:“马克思能这么死就挺不错的了,至少不用躺在病床上受罪。”

小邓说,他在医院病房里经历的死亡,大多意味着体力活儿,抑或是一场令人疲惫的拉锯战。每次值夜班,隔不了几十分钟他就会被叫起来,急冲冲推着医疗推车冲进病房,按照标准在胸口按压几次,再根据流程胸外电击几次,来来回回如是往复,往往折腾了一整夜,只是单调枯燥的医学操作。有时候他觉得自己面对的似乎不再是具体的“人”,而是标注着疾病指征的“病”。

“现在医学技术的进步,让死亡的定义已经被颠覆了。今天的医学几乎可以让我们实现‘永不关机’,你可以插一根管子,在机器的帮助下一直维持生命体征。”王一方说,“今天的死亡几乎完全变成了一个技术抢救的过程。冲着1%的希望,花费100%的努力。没有灵性的照顾,没有让病人给亲人道别的过程。”

所以,他常常在课上,对台下那些未来的医生说:“你们一定要记住,我们对待死亡有两面,一面是抗争,一面是妥协。现在你们是战士,面对死亡只能抗争,不能放弃。可真正的好大夫既要当战士,又要当将军,既要有魄力发布总攻令,也要有智慧签署投降书。”

然而,跟死亡妥协的经历,却让小邓这样的医学生难以避免地感到烦躁。他所经历过最难忘的“死亡课”,来自临床工作中遇到的一位患肿瘤的老人。那是凌晨一两点钟,小邓一次次被护士叫起来,冲进老人的病房,一遍遍重复“没完没了”的技术操作。躺在病床上的老人每次苏醒过来,就虚弱地小声鼓励小邓,要努力学习,医生的工作很有前途。小邓累得额头冒汗,结局却并没有因此改变,死亡还是不可避免地到来了。

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,老人看着被自己折腾得一整夜都没法睡觉的年轻人,用仅剩的一点力量,轻轻捏了捏小邓的手,艰难地说出他人生最后一句话:“抱歉。”

8 “我的目标是,让学生们通过《死亡哲学》试试如何去思考死亡。”卡根说,“至于死亡本身,我本来也没准备一个唯一的正确答案。我只希望学生们可以在这里找到思考的方法,真的静下来跟我一起想想‘死亡’这个问题。”

而身在的王一方跟大洋彼岸的卡根也有差不多的念头。“我追求的是灵魂的发育,而不是知识的灌输。”王一方说,他最后也不期待什么的考试,只要学生写篇文章,说明白自己心里在想什么,这就行了。“我不需要你告诉我死亡的定义是什么,大多数人要到了45岁以后才开始真正思考死亡这件事,我就期望你可以在25岁试着面对一下45岁的问题,自己去思考。”

不过,跟着他一学期后,有些学生也变得像他一样,一张口就文绉绉的。临结课的时候,他们还能学着王一方的样子,背出史铁生的句子:“死神就坐在门外的过道里,坐在幽暗处,凡人看不到的地方,一夜一夜耐心地等我。”

李斐然